

不知道接受祭祀的火神能否读懂人们矛盾而隐秘的心思:在云南红万村,人们一边举行盛大仪式祈求丰收,一边却让前来参加庆典的“贵宾”们开车碾过还没来得及抽穗的麦田。

在这座位于云南省弥勒县的村落里,庆典显得神秘而庄严:彝族的阿细人在大树上重演先人“钻木取火”的场景,将新一年的火种传给村里的家家户户。按照当地的习俗,人们在火光里烧尽邪魔污秽,并且祈祷新的一年“风调雨顺,人寿年丰”。

很难说这样的祈祷是否足够真诚。至少,在网友拍摄的若干张图片中,当庆典邀请的客人开车前来时,当地政府所竖立的“贵宾停车处”指示牌,就指引着那些沉重的轮胎从村口地里绿油油的麦苗上坦然碾过。



不适应
图/Newscaiton
作者 张保山

重庆规定临时工不得行政执法

人民日报 为规范行政执法人员行为,重庆市政府于近日出台了《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》,其中明确了获得行政执法资格的门槛:行政执法机构中在编在职、拟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,资格培训考试合格、年度考核在称职以上,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,才能进行申请。

《办法》同时规定,不直接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;受过以上处分未解除的;合同工、临时工以及借用人员;年度考核不称职的;因违法或者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的等5类人员不得申请行政执法资格。(刘志强)

复旦“裸考生”录取六年降七成

东方教育时报 “自主招生比例,把我们‘逼’得没有选择的余地,不敢不参加自招,因为凭‘裸考’太难考取了。”记者近日不止一次听到学生和家长无奈地这般说道。

考生与家长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,“裸考生”占高校最终录取学生的比例近年来直线下降。根据不完全数据显示,2006年,复旦大学在上海招生1490人,其中通过自主招生预录取的有298人,通过“裸考”录取的有1192人,“裸考生”占最终录取学生的比例约为80%。2008年,复旦在沪招生人数降至1300人,而由于自主招生预录取和保送学生增加到500人左右,“裸考生”占最终录取学生的比例降至60%。这一比例到了去年更是创下新低。复旦大学2011年在沪招生近900人,保送和自主招生预录取的学生人数达到720人,再去掉艺术、体育特长生以及通过博雅杯被录取的53人,留给“裸考生”的录取名额微超100个,“裸考生”占最终录取学生的比例仅10%左右。从2006年到2011年,复旦大学“裸考生”占在沪招生总人数的比例少了七成。(徐媛媛)

今天,2月29日,每4年才有这么一天。这个“罕见”的日子,也是“世界罕见病日”。愿我们关注的目光,能给罕见病患者和他们的家人送去温暖。

2月26日晚8点半,记者接到一个电话:“庄莺莺申请到了PKU奖学金!她是中国第一个!”

激动诉说的母亲名叫黄莺子,一位普通的上海女工。初次见面,记者印象最深的是她的“板寸头”——她说这样方便打理,因为她把精力都放在了女儿庄莺莺身上。自出生起,莺莺就被确诊为“苯丙酮尿症”(PKU),一种在我国发病率低于十万分之一的罕见病。

由于身体中缺一种酶,PKU患者无法分解、代谢苯丙氨酸,当这种东西在血液中聚积,会损伤孩子的大脑,让他们变傻,自残乃至死亡。

万幸的是,这种罕见病还有办法应对——通过特殊“喂养计划”,尽量不让患儿吃进苯丙氨酸,可以保护他们的大脑和智力。黄莺子为此操劳了

“这本来是一场群众性的活动,为什么政府介入之后,一定要和群众分得那么清楚?”—— 当祈求丰年的车轮碾过麦田

祈求丰年的庆典中,麦苗却这样死去了。

在组织盛典的弥勒县政府看来,祭火节带来了巨大的旅游经济效益,甚至成了“当地的一张名片”。相比之下,一片小小的麦田既没有轰动效应,又无法拉动GDP,退而变为停车场,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当有网友把当地“麦田变停车场”的行为发布之后,当地政府立刻发布声明解释说,为了便于整个活动的协调、管理,才把一些工作用车停

到了距离活动现场最近的麦田里。根据这份官方声明,照片上看起来郁郁葱葱的麦苗其实并没有那么精神,而是已经因为当地持续的干旱而“完全绝收”了。因此,政府把麦田辟成停车场,还让当地农民“占个便宜”,拿到每亩200元的“青苗补偿费”。

“牺牲了他个人的利益换来了整个村集体的收益,在干旱之年完全绝收的情况下,还有青苗补偿费……他们是支持的。”当地官方微博“弥勒警方”说。

在这些争论中,没有人关注那些

的车辆,才大喇喇地从麦苗上碾过。

一位“顺路参加活动”的媒体记者拍下了这一画面。在随后接受采访时他说,自己希望在关注麦田、青苗补偿费的同时,也提醒人们关注在全国各地举办活动时,权利被损害的现象。

“这本来是一场群众性的活动,为什么政府介入之后,一定要和群众分得那么清楚?”这位记者说。

事实上,在红万村之外,巨大的车轮仍在继续向前。被碾压的,本不止这一片麦田。中国青年报(付雁南)

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“岛”了。它只有2.5平方米,却也树木葱翠、绿草如茵,尽管它们只是平面装饰而已。红顶白墙的小屋是真实存在的,里面还有张铺了小被子的婴儿床和一台保温箱。

屋里空无一人。大多数时候,哭声会在深夜或清晨响起。至少有20多人找到了这座小岛。他们拐进石家庄西郊这条僻静的胡同,走到尽头,把怀里的孩子悄悄放在这里。

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、延长婴儿存活期,2011年6月1日,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这座“婴儿安全岛”。截至今年1月底,共发现弃婴26名。

随之而来的是争议。有人认为,弃婴是违法的,设置专门接收弃婴的设施,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。

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也曾为此感到纠结。最终,他用这样一句话说服了自己和同事:“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,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。”

等待第一个孩子

在韩金红的印象中,安全岛出现前,福利院附近每年能发现十多个弃婴。他们大多躺在纸箱或编织袋里,极易因寒冷或炎热导致病情加重。有的孩子被发现时,甚至已经遭到流浪猫狗啃食,身上还爬着蚂蚁。

在一次会议上,他听说国外有一些保护弃婴的举措,便打算在福利院门口也设置一个弃婴保护设施。德国、意大利、捷克、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弃婴安置场所大多位于教堂和医院,配备保温和报警系统。这样的举措得到政府的鼓励。但在国内,弃婴安全

岛的概念还没有被尝试过。

2011年6月1日,石家庄社会福利院为婴儿安全岛举行了落成仪式。这座四四方方的小岛造价近10万元。值班人员每两个小时巡逻一次,放置婴儿的人也可以自己摁下延时报警器。

最初,为规避福利院的风险,韩金红还考虑安装摄像头。但他担心有了摄像头,弃婴家长不敢靠近,设施沦为摆设,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在矛盾与忐忑中,院里的人等着小岛上第一个婴儿的到来。可十几天过去了,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每天都有人忍不住问:“怎么还没来?”

韩金红也有些着急:“之前就有

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举措引发争议——

弃婴安全岛人道或纵容?

人说我作秀。如果之后一个孩子都不进来,别人就会说:‘看你这秀作的,钱花了也没效果。’”

直到6月15日晚上9点,值班门卫安玉红例行巡逻时,发现屋里多了一个纸箱,里面躺着一个男婴。

安玉红拨打了110,民警到现场后,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,定义为弃婴并出具捡儿童证明。他随即被福利院接收。经检查,这个男孩刚出生3天,患有先天性愚型,无法治愈。

第一个弃婴出现了,接着是第二个,一个4个月大的女孩,患有严重脑积水。仅仅两个多小时后,第三个弃婴又出现……半个月的时间,安全岛连续接收3名弃婴。

坚定抛弃决心?

门卫安玉红很难再有清静的夜晚了。一天夜里,他连着捡到3个孩子,其中一个孩子的被子里还掖着小纸片,上面写着:“我是一个年轻的未婚妈妈,实在没有办法了……”

大多数父母并没有摁响报警铃,直到值班人员巡逻或是这些孩子哭出声,才被人发现。

交警部门在马路旁边为这个小岛设置了醒目的指路牌。

有人问韩金红,这样的宣传会不会坚定一些家长抛弃孩子的决心?

“发达国家也避免不了弃婴。”韩金红说。“不能说多一个安全岛,不良父母就增加了。福利机构没法改变社会贫困,我们能做的就是如果你遗弃了,我们让你的孩子活得有尊严。”

但这个逻辑并不能让每个人都接受,“这是怎么个情况?难道是告诉大家:想扔孩子的尽管来扔啦,不用有后顾之忧!”在网上,有人这样说。

救助质量提高

争论一直在持续,韩金红的心也随之起起落落,直到石同桃的出现。石同桃是第21个出现在小岛上的弃婴。一个阴冷的清晨,安玉红发现了这个皮肤雪白的女婴。

2011年6月至11月,安全岛接收婴儿21名,但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全市范围内接收的弃婴是75个,低于2010年同期的83个和2009年同期的105个。“弃婴总数没有增多,只是集中到一起了。我们门口的多了,说明孩子的救助质量提高了。”他这样解释。中国青年报(王晶晶)

19年。去年夏天,庄莺莺考上了大学;如今,她申请到了美国PKU信息联盟(National PKU News)设立的TheRobert Guthrie PKU奖学金。

“不食人间烟火”

庄莺莺上学了。起初,老师、同学都没发现她有什么特别,“她成绩好,又活泼,下了课总爱踢毽子、跳皮筋。”直到有一次搞活动,莺莺坚决不肯喝酸奶。从小到大,她沾嘴的

“世界罕见病日”到来前夕,患者申请到了奖学金—— “孩子,你是天上来的仙子”

奶制品都是从医院买来的“药奶”。

罕见病,又称“孤儿病”,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“患病人数占总人口0.65‰到1‰之间的疾病”。

1995年,我国已掌握罕见病PKU出生婴儿缺陷的筛查手段;在上海,1993年就开始了试点筛查。庄莺莺正巧在1993年出生,“苯丙酮尿症”这个拗口的医学名词,让她全家顿时陷入了恐慌和绝望。

医生严肃地告诉黄莺子:“普通孩

子能吃的大部分东西,她都不能吃。”

那她能吃什么?“苯酮宁”,是黄莺子最早从医生那里听说的一种特殊食品,这便是“药奶”,至今仍是庄莺莺维系生命的主要“能源”。跟其他PKU患者的特殊食物(简称“特食”)一样,“药奶”经过特殊处理,将奶中的苯丙氨酸去除或减少到了极低含量。天然食物大都含有蛋白质,而天然蛋白质中含4%-6%的苯丙氨酸,这已远远超过PKU患者所能

承受的极限,因此他们必须一辈子与普通的肉、蛋、奶、豆制品绝缘,不碰这些会致命的“毒药”。为防孩子忍不住“偷吃禁食”,PKU家庭都会反复反复跟他们说:“你是天上来的仙子,不能吃人间的东西……”

胆战心惊的“实验”

黄莺子是新华医院的常客。“孩子逐渐长大,规定能吃的‘药奶’的那个量不够了,饿得天天哭,怎么

办?”分娩不久,这个着急的母亲迫切地想从医生那里讨教到喂养知识。但彼时,除了“药奶”PKU患者还能吃什么,医生也所知甚少。

徐洁(化名)也是一名PKU患儿的母亲,1996年,在医院拿到确诊书后,还在坐月子的她就天天跑上海图书馆,希望从书里找到“食谱”。“资料很有限,一本《食物成分表》被家长们奉为‘圣经’。”

慢慢地,家长们发现藕粉、土

豆、山芋、苹果等低蛋白质含量的食物是安全的,可以拿来给孩子“改善伙食”,但还是太单调了。

家长们也曾有过不少“冒险”。“怎么知道孩子能不能吃香豆苗、清炒胡萝卜?就让孩子当天只吃这一种‘实验’食物,然后去医院测苯丙氨酸血浓度。”徐洁说,这样的“实验”令人胆战心惊。

后来有一次,经常光顾医生办公室的黄莺子有了让她激动不已的发

现:医生办公桌上放着两袋外国食品,“这是日本的特食大米和年糕的样品,专门针对PKU患者研发的。”

再后来,黄莺子们知道了,在国外“特食”已经成了一个产业,不过,是昂贵的。1997年,黄莺子托朋友代购的日本“特食”大米,2斤200多元。

渴望“制度的温情”

PKU家庭注定要长久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。庄莺莺说,自己的“安全长大”离不开社会各方的援助:“读中学时,学校减免了部分学费,还得到街道、居委的民政补助;在市卫生局、红十字会努力下,我每月能得到医药费补助……”

“为孩子多争取一些社会关注和关心,是PKU家庭的心愿,他们希望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医疗保障制度能够完善,孩子就业能得到照顾,也希望特食的研制生产能获得政府部门的关心与政策优惠,等等。”

“妈妈愿意倾其一生来保护你,但妈妈很可能会先你一步离开这个世界,所以,只有制度才能保护你一辈子。”一位PKU母亲的话,让多少人听得潸然泪下。文汇报(唐闻佳)